

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时代的价值共识及欧盟认同

古力加马力·阿不力孜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100089)

摘要：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以欧盟为实践范式阐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超国家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和后民族民主的可能性及其路径。将欧盟制宪、宪法爱国主义和公共领域的商谈民主理论作为欧洲一体化的理论基石，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价值共识和价值分歧展开研究，尤其是英国脱欧后欧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以此探索其理论的实践可能性。他处于从自身的阶级利益考虑构建未来社会理想的蓝图，通过民主交往理论达成和解，却忽视了阶级斗争的革命性，试图以强权话语政治为原则通过改良主义的方式构筑不同体系之间的桥梁，他的理论体系与当今社会的可实践性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关键词：哈贝马斯；欧洲一体化；欧盟制宪；价值共识

一、欧洲一体化理论体系的现实意义

全球化对民族国家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在移民和不同文化价值的碰撞下，民族国家内部出现了文化多样性和主流文化的差异性。尤尔根·哈贝马斯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师，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他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演变和实际状况，提出以宪法爱国主义为核心的集体认同的后民族国家理论，以及世界公民社会理论，以自己的视角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解读，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的危机。哈贝马斯的理论体系主要以欧盟为实践范式阐明一体化进程中超国家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和后民族民主的可能性及其路径。带有康德哲学的“世界主义”特征。

他对欧洲一体化的理论基础、内外动力、具体思路、最终目标等都做了系统的学理性阐述，提出了欧洲公共领域的开创性概念，阐明了欧洲认同、国际法的宪政化、欧洲政治文化等思想，并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提出建立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来应对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冲击。哈贝马斯将欧洲作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未来世界政治格局典范来考察，从后民族国家集体认同、公共领域构建和公共文化的形成促成欧盟一体化的合法性，将“欧洲宪法”的制定视为一体化的理论基石，提出政治上身份认同、文化上身份认同、宪法上身份认同以此构建欧盟一体化的政治架构。哈贝马斯认为欧盟、东亚共同体、联合国及各种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是全球治理有利的实践载体。

二、欧洲一体化价值认同和文化共识

欧洲文明起源于爱琴海文明，与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文明和拉丁-日耳曼文明一脉相承，形成中世纪欧洲文明。而后经过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启蒙运动、实证科学的发展，又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近代欧洲文明逐步形成。欧洲各国有着共同的古代文化基因和背景，欧洲各国人文学家对古典文化有着共同的认可和追忆，这也成为欧洲文明共同的文化遗产，为日后实现欧洲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这也就是哈贝马斯所提的“文化认同”。尽管欧洲各国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语言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的特殊性，彼此之间也曾不断发生冲突和战争，但是各国彼此又共享以人文精神、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民主政治、科学思想等为基本价值的欧洲文明，他们差异性的同时，又存在文化和政治的“内在一性”和“同质性”。

欧洲是人类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的肇始和策源地，欧洲各国对战争的体验和反思恐怕比任何国家都为深刻，同时认识到只有联合求发展创建欧洲新秩序才是欧盟唯一出路。尽管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有诸多波折和险阻，甚至有倒退和分裂的可能，但是哈贝马斯仍然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和未来抱有信心。他认为在欧洲公民参与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讨论就能出现规范和大众的共识，欧洲公民身份的建立在文化上有一定的相通性和认同感，政治上各国公民也认可欧洲联盟公民的身份，“欧洲意识”在无数仁人志士的奔走呼号下早已确立。卢梭的《永久的和平》，康德的《论永久和平》，贝多芬以“欧洲”为主题的乐章等等，都深刻表达了这种思想。欧洲人从未放弃寻求彼此间和平共处方案的尝试。

三、欧洲一体化价值分歧和英国脱欧

1、文化认同缺失

哈贝马斯认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各成员国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上多有龃龉无法达成共识，究其原因在于缺乏共同的政治文化支撑和欧盟公民身份未被认同。比如说各成员国首先认为自己是法国人或者德国人，然后才会提及自己是欧盟公民的一分子，而更重要的是欧盟一体化进程主要有统治阶级精英层面推动，普通民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甚至不认同欧盟，因为他么从中得到的好处甚少。欧洲一体化文化认同缺失也是促使英国“脱欧”重要的一个原因。欧盟成员国的民族意识还是占主导作用，欧盟仍然是以民族国家意识为导向的欧洲，民众也开始对欧洲一体化和欧盟的合法性产生了质疑。

2、英国脱欧

(1) 一体化进程中疑欧主义主导英国民族心理的不稳定性

英国的疑欧主义与共同体其他成员国相比还具有普遍性和长期性的特点，疑欧主义情绪存在于英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从统治阶级到大资本家再到中下层普通民众，疑欧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内化成为一种民族心理，疑欧主义自诞生之日起，便长期占据了英国主流社会政治心理的一席之地，对英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国社会的疑欧主义思想开始于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由于国内反对声音此起彼伏，而在野党又往往善于利用民意和舆论攻击执政党的欧洲政策，导致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执政，在制定对欧政策时均需要全方面考虑民意并审慎制定政策。

(2) 英国议会主权与欧盟宪法的不兼容性

英国的宪政结构是以议会制为核心的。英国政治强调国内议会主权的至高无上，这是英国宪政结构中难以动摇的基础，并早已内化为英国的政治传统理念。英国这种议会主权至上观念与欧盟法的“最高效力”原则相互矛盾，英国议会权力至高无上，任何议会通过或确立的法律在英国具有最高效力；而欧盟法“最高效力”原则以为这欧盟法优于任一成员国的国内立法。这意味着欧盟能够通过立法使英国议会的立法无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订立启动了经济联盟和政治联盟，欧洲一体化进程加速，尽管英国在其中依旧享受一定的特殊待遇和优惠政策，但主权进一步从英国转移到欧盟的趋势也愈发明显。2011年7月通过的《欧洲联盟法令》在形式上宣判了英国议会立法权的至高无上，但是它是无法根除英国国内法与欧盟法之间深层次的矛盾，加之英国统治阶层和主流政党对这些政治意识形态思想的恪守，导致它们或从正面或从侧面、或直接或间接地拉远了英国与欧盟在理念上和实践上的距离，最终使得英国通过一场全民公投脱离欧洲联盟。

(3) 英国脱欧和欧盟一体化进程的不确定性

英国、法国和德国共同组成欧洲经济的三驾马车，英国是欧盟中仅次于德国和法国的第三大经济体，英国退出欧盟意味着欧盟综合的经济实力大大下降，欧盟从此失去了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称谓。英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之一，也是当今世界极少数掌握核武器技术的国家之一，英国退出欧盟后，欧盟整体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不如从前，欧盟的安全防务能力被削弱，在面临来自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的压力时，决策空间极大缩小。英国脱欧引发和增强了欧盟盟内其他成员国公民的离心倾向。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炉后，包括法国、意大利、瑞典、比利时在内的欧盟成员国国内，纷纷出现了公民上街游行，号召和要求本国政府效仿英国，在国内举

行脱欧公投的现象,欧盟成员国内部公民的凝聚力受损严重。“欧盟去一体化”议题开始在学术界流行起来,欧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新挑战。

三、哈贝马斯欧盟治理方案

1、《欧盟宪法条约》和宪法爱国主义

面对民众对欧盟合法性的质疑,哈贝马斯开始思考如何去构建其合法性,让民众对欧盟产生认同感。哈贝马斯提出欧盟要获得合法性就需要培育一种共同价值的欧洲统一观念,他认为如果欧盟想要获得广大民众对其的认可,仅仅依靠在经济上的利益是不够的。在此之外,还需要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哈贝马斯提出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通过宪法爱国主义来实现集体认同,建立欧洲共同身份,建立欧洲公民意识。并制定一部欧盟宪法,让欧洲公民身份在政治领域上得到认可,同时培养跨越国家的宪法爱国主义,把宪法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共识性的原则,在宪法规范之下,人们会得到保护与尊重,享受自由与平等,在宪法原则之下人民凝聚成一个共同体,从而推动政治共同体,承认欧洲公民身份,并形成欧洲公民精神,从而塑造全新的超越国家界限的欧洲公民团结关系。通过《莱肯宣言》欧洲制宪也正式启动,欧盟各国通过了首部宪法性条约——《欧盟宪法条约》,在政治上使欧洲各国脱离民族认同的依赖和界限,促使形成欧洲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模式。

2、哈贝马斯集体认同和商谈民主思想

欧洲成员国各自具有相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一个根植于同根同源历史文化、民主制度基础上的市民社会和政党体系,具备超越国家公共领域的交往关系,这些有利因素都为促成欧洲联邦国家的联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哈贝马斯认为基于欧洲共同传承的文化因素,商谈与对话是最好的平台,通过重新审视民主制度,塑造共同信仰的政治文化来达成欧洲价值共识。哈贝马斯集体认同和社会整合理论以商谈民主思想为基础,他认为不同文化主体之间要平等、要交往、要对话、要融合,通过商谈民主交往理论达成共识。哈贝马斯提出了“世界市民”和“世界共同体”,通过民主、对话、交流的形式,寻找一种交往的合理性,实现人类社会合理性发展。他认为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冲击下,“民族国家”在面临挑战,民族国家进入后民族结构时代,需要建构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通过以宪法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新的集体认同来赋予跨越国界的社会一体化形式的合法基础。尽管欧洲一体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中间诸多险阻,但哈贝马斯仍对欧洲一体化发展进程抱有信心。

四、哈贝马斯理论体系的可取之处

欧洲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特朗普反全球化事件、民粹主义的兴起、贸易保护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闯入下重新架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潜藏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危机蔓延至国际社会,全球治理模式有待新的模式重组。虽然哈贝马斯的世界主义思想带有乌托邦的色彩,但是哈贝马斯理论体系中,也有值得借鉴和可取之处,他认为当今世界处于一个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体系中,要以共同利益为导向,在全球公共领域决策中需塑造共同的政治生态话语和价值理念。打破垄断,增强认同,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构建国家之间的分歧。他从自身立场出发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具有西方资本主义色彩的全球治理模式的理论体系,他期寄与互相尊重及商谈中相互理解达成“共识”。哈贝马斯基于欧洲政治社会危机的审视和反思,提出后民族国家结构的“世界公民社会”,以其来实现全球治理的话语政治,设计了欧洲一体化的蓝图,同时对当前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全球治理模式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哈贝马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民族国家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继承、丰富,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研究国家理论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他基于康德的理论架构努力寻找欧洲“永久和平”的道路,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及欧盟的未来提供可参考的理论实践范式。哈贝马斯以欧盟政治实践经验为基础,提出了一种所谓“宪法爱国主义”的政治理论,侧重于政治公共领域与交往空间的结构化和制度化,为解决社会整合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同时他的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解决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危机,以及未来的发展道路提供了自己的

视角。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后民族的民主观虽然存在超越现实和历史发展阶段的弊端,但作为一种中观理论,对欧洲认同的规范性描述与欧洲一体化的经验事实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为我们认识欧洲宪法与欧洲认同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他的“世界公民社会”构想在一定程度上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提供了思维借鉴。同时也为习主席倡导的“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和连接中亚几国的陆地丝绸之路区域一体化建设提供价值参考。

五、哈贝马斯理论体系的现实局限性

哈贝马斯基于康德的智识设计,构想的“世界公民社会”以及“全球治理”思想,无非是处于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立场出发而言。他处于从自身的阶级利益考虑构建未来社会理想的蓝图,通过民主交往理论达成和解,却忽视了阶级斗争的革命性。哈贝马斯将人权置于主权之上,将民族国家的政治存在空洞化,无疑为国际政治中的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另辟蹊径。哈贝马斯站在第一世界优越感的立场上建构世界共同体思想,把欧洲文化看作评判其他文化的标准,忽略西方殖民掠夺和资本主义扩张给人类带来的罪恶和痛苦,以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和普世理论来谈所谓的世界共同体,试图通过强权话语政治为原则,构建不同体系之间的构筑桥梁其结果必将徒劳无获。

哈贝马斯的民族国家理论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视角解释民族国家,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资本主义国家在当代所面临的危机以及如何应对危机的这两方面。从现实角度来看,民族国家依然是全球性的主体,衰落的现实性并不充足。而且欧洲一体化发展到现在,也并没有出现超越民族认同的新的集体认同,全球化虽然对民族国家经济上管控权力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是民族国家却用新的职能弥补了这些缺失。一方面,国家在公共教育、医疗健康、艺术体育、就业、财政税收等等这些方面都制定了规则进行管理,这表明民族国家的管理领域更加全面,管理权力更加集中。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受益于马克思社会劳动思想的启发。他的思想涉及公共领域、交往理论、意识形态及现代性等多个层面,他提倡的理论是想通过改良主义去实现,通过彼此之间协商的交流来达成认知共识,这对当前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实现的可能性有待商榷。

参考文献:

- [1]王展鹏:《宪法爱国主义与欧洲认同:欧盟宪法的启示》欧洲研究 2005年第5期
- [2]安东尼·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宇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 [3]马巧:《后民族主义的认同建构及其启示争论中的哈贝马斯国际政治理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 [4]李明明:《超越与同一:欧盟的集体认同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5]徐闻:《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论研究》,2011年山东大学哲学博士论文。
- [6]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郭忠华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 [7]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化,2000年版。
- [8]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
- [9]Jurgen Habermas, The New Conservatism: Culture Criticism and the historians' Debate,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9.
- [10]John L. Brooke, Reason and Passion in the Public Sphere: Habermas and the Cultural Historians,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Summer, 1998), 43 - 67.
- [11]Schaefer. Michael, Communicative versus Strategic Rationality: Haberma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and the Social Brain, PLOS ONE, (May 2013), 1 - 7.